

一九四八至一九六三年中共祭黄帝陵活动研究^{*}

章舜粤

[摘要]1948年黄陵县解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每年于清明节举办祭黄帝陵活动,直至1964年中断,并于1979年恢复。在这一祭祀活动中,中国共产党对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通过祭黄帝陵,高扬爱国主义旗帜,推进统一战线工作;传达党的政治理念和政策目标,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这使其成为当代中国仪式政治的一个鲜明样本。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黄帝陵祭祀;政治仪式;符号象征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21)02-0064-10

目前,学界对于黄帝陵祭祀的研究,主要集中讨论民国时期国民党的祭陵活动,很少有人讨论中国共产党主持祭祀黄帝陵的情况^①。事实上,自1948年黄帝陵所在黄陵县解放以后,中共主持祭祀黄帝陵的活动就已开始,直至1964年中断,后又在1979年恢复^②。1948~1963年间,中国正处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中共主持开展的黄帝陵祭祀活动极富革命色彩,与之前祭祀活动有较大区别,与改革开放以后的祭祀活动也有所不同。具体来说,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黄帝陵祭祀活动中,通过赋予“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传达其政治理念,进行统战工作与政治动员,是中国现代政治仪式的一个样本。本文即从政治仪式的运作与象征符号的构建等角度出发,对这一时空背景下的黄帝陵祭祀做初步考察。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规划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20ZDGH017)阶段性成果。

① 王旭瑞在其论文中梳理了黄帝祭祀的流变,指出它“是一个象征符号不断被创造、操弄和利用的过程”。李俊领的硕士学位论文中,研究了晚清及民国时期的黄帝陵祭祀。他和殷定泉后来对陕甘宁边区的黄帝陵祭祀也从仪式政治的角度出发做了研究,是有关领域少见的相关研究。郭辉从国家纪念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对国民政府以黄帝陵祭扫为中心的“民族扫墓节”做了研究。台湾学者周俊宇同样涉及了这一题目,同时研究了国民党去台后于台湾遥祭黄帝陵的情况。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有关黄帝陵祭祀研究,主要有任贵祥从华侨视角出发所做的研究。参见王旭瑞:《历史之为记忆:黄帝祭祀的流变》,《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2期。李俊领:《中国近代国家祭祀的历史考察》,山东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李俊领、殷定泉:《抗战时期的黄陵祭祀典礼》,《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李俊领:《仪式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礼》,杨凤成主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郭辉:《国家纪念日与现代中国(1912—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周俊宇:《塑造党国之民——中华民国国定节日的历史考察》,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任贵祥:《海外华侨华人的中华文化情结——以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祭祀黄帝陵为视角》,《长白学刊》2016年第2期。

② 1948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曾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义于1937至1939年参加过三次祭黄帝陵。不过这几次祭陵是由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所主导的,中共只是陪祭而非主祭,与1948年以来以主祭身份进行的祭陵有本质区别。1948年3月10日,黄陵县和平解放,5月7日成立县人民政府。1948年和1949年陕甘宁边区均派代表公祭黄帝陵。自1948年3月10日至1949年10月1日之间,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但这两次祭陵均是在中共领导下由人民政权具体举行的。因此本文将它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祭典放在一起讨论,而不拘泥于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下文提及“解放后”的祭黄帝陵时,如非专门说明,一般指1948年陕北地区解放、建立人民政权之后。

一、移植与创造：中共的黄帝陵祭祀

中共在延安时期曾参加了三次黄帝陵祭祀，但均未作为主要操办者，而主要将祭典作为宣誓自己抗战决心和督促国民党抗日的政治表演舞台。1948年黄陵县解放后的公祭黄帝陵活动，是中共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义，第一次作为主祭者操办的祭祀。有人认为边区政府的黄陵祭祀“是一种由政党与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现代政治仪式”，“于1948年开创了独立祭祀黄帝的革命礼仪传统”^①。的确，通过开创一种新的祭祀传统，中共赋予了黄帝陵祭祀以新的解释与功用。但它也有着历史的演变过程，对古代黄帝祭仪和国民党的“民族扫墓节”有着一定的继承性。

1935年首届“民族扫墓节”，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派代表祭黄陵，其仪式程序为：“（1）全体肃立；（2）主祭者就位（中枢及陕西省代表）；（3）上香；（4）献爵；（5）献花；（6）读祭文；（7）行三鞠躬礼；（8）礼成；（9）摄影。”之后，参加谒陵的人员“均往瞻仰黄帝庙”^②。这一仪式自此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祭陵活动基本沿用。如1937年的程序是在“主祭官就位”与“上香”之间增加一个“与祭官就位”，以及“行三鞠躬”和“鸣炮礼成”之间增加“静默三分钟”两个程序^③。1938年的祭奠在“静默三分钟”和“鸣炮”之间又增加一个“奏乐”^④。1939年祭陵则在上香前增加“恭读总理遗嘱”一个程序^⑤。此外，祭祀者最后往往还有一个绕陵墓一周并拜谒轩辕庙的活动^⑥。就现场的布置而言，以1942年为例：“陵前搭一布棚，为临时祭亭（每年祭扫时，由中部县商会临时租用商号布正搭架，事毕交还，不支租金），棚中置一桌，陈设酒醴、果品、祭菜（十碗）、杯箸、香炉、烛台（均临时借用），并花供一幅（即用面制成各种人物花卉，计十余件，式样颜色，颇具匠心），花圈二个（上款书‘中华民族始祖黄帝灵鉴’，下款分书‘国民政府代表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敬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晋陕监察使王陆一敬献’等字）。”^⑦可见，国民党的黄陵祭既有“主祭”“配祭”“与祭”等传统祭仪的符号和“上香”“献爵”“献花”“读祭文”等传统祭仪，又有“全体肃立”“行三鞠躬礼”“静默三分钟”“鸣炮”等现代仪式因素。在祭典现场布置上，同样既有传统因素如祭亭、香案和酒醴、果品、祭菜等，又有现代式样的花圈。

1948年和194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祭陵的仪式与国民党的祭礼高度相似。1948年的祭典上，革命“对联高悬于松坊两旁。祭亭满陈祭菜酒醴果品花圈，银烛辉煌，香烟环绕”^⑧，参与祭祀者按序就位后，“鸣炮三响，祭仪开始，上飧（香）、献爵、献花圈、读祭文，行三鞠躬礼”，默念完毕后，赵寿山又发表讲话。“讲毕，礼炮齐鸣，继在军乐声中，全体摄制影片后，绕陵墓一周。主祭配祭人员并循路至桥山左下谒黄帝庙，祭礼始告成。”^⑨其中奏乐鸣炮时，“挂在陵墓周围

① 李俊领：《仪式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礼》，杨凤成主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2辑，第88、93页。

② 《中枢代表祭扫先陵之经过》，《中央日报》1935年4月15日，第1张第2版。

③ 《恭祭黄陵及周茂陵》，《西京日报》1937年4月6日，第6版，转引自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陕西省志·黄帝陵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

④ 《致祭黄帝陵寝》，《西京日报》1938年4月6日，第6版。

⑤ 《民族扫墓节公祭黄帝陵 中央特派大员张继主祭 边区代表团亦赶往参加》，《新中华报》1939年4月10日，第3版。

⑥ 参见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陕西省志·黄帝陵志》，第141～143页。

⑦ 吴致勋：《谒陵恭记》，转引自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陕西省志·黄帝陵志》，第145～146页。

⑧ 《陕甘宁清明节祭扫黄陵 仪式极为庄严隆重 赵寿山将军陵前痛斥蒋贼》，《人民日报》1948年4月13日，第2版。

⑨ 《刘副主席、赵副司令员、甘主任代表西北各界隆重谒祭黄帝陵》，《群众日报》1948年4月10日，第1版。

树上的万响鞭炮齐鸣,震耳欲聋”^①。1949年的祭陵典礼同样在军乐和礼炮之后宣布开始,“斟酒、献爵、献花、恭读祭文、烛光辉煌,香烟缭绕”^②。

将中共的两次祭仪与国民党主导的仪式相比,可以发现二者颇为相似,事实上都是一种“利用传统制作出政治仪式”^③。而最为简单直接的原因则是因为中共对如何祭黄陵并不熟悉,所以“临时聘请了原来在解放前曾担任过黄帝陵园管理处管理员王学三帮助我们筹备祭陵有关事宜”^④。黄帝陵园管理处即民国时期专门负责管理保护黄陵的机构。1939年5月26日,陕西省政府委员会第92次会议修正通过《陕西省黄帝陵园管理处简章》^⑤,6月管理处正式成立,中部县县长芦仁山兼任主任,旋于8月改王学三为主任^⑥。由此不难理解何以1948年和1949年的祭仪与国民党主祭时期如此相像,主要原因即在于指导仪式者本来就是相同的。

这一系列仪式在1949年之后也得到了继承。1950年的祭黄陵活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后的第一次祭陵,“上香、献爵、读祭文如仪”^⑦。1953年祭礼由主祭人“敬献花圈,恭读祭文”,“祭奠毕,主祭人和陪祭人绕陵一周,并晋谒轩辕黄帝庙”^⑧。1957年的祭典也有“上香献爵、献花圈”等环节^⑨,基本程序依然得以保留。会场则布置有三幅对联:祭奠处悬挂一副,陵墓上悬挂一副,轩辕庙中悬挂一幅^⑩。

虽说中共一开始对祭黄陵的仪式并不熟悉,但也绝非一无所知。早在1937年国共两党公祭黄帝陵前,毛泽东就请叶剑英向国民党方面“询问礼节仪式及日期见告”^⑪,林伯渠等人也作为代表参加了几次公祭。此外,中共还在延安多次独立举办了对成吉思汗的祭礼,并制定了一系列别具特色的祭仪^⑫,对“将传统帝王陵寝祭礼演绎成现代政治仪式的理念与路径”^⑬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以起义等方式参加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他们对祭黄陵典礼也是熟悉的。如曾任组建黄帝陵修建委员会的张治中和1938年代表国民政府主祭的孙蔚如(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曾担任黄帝陵祭祀的主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祭仪具有延续性的原因。

尽管新中国的祭黄陵典礼与民国时期的祭仪颇有相似之处,“上香”“献花”“献爵”“读祭文”或“鸣礼炮”“奏军乐”等仪式,实际上都是对传统祭仪与西方现代政治仪式的借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革命文化的传播,一些人对带有传统文化色彩的祭仪也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封

① 冯力生:《回忆解放后首次祭谒黄帝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黄陵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黄陵文史资料》第6辑,1994年版,第20页。

② 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陕西省志·黄帝陵志》,第143页。

③ 郭辉:《国家纪念日与现代中国(1912—1949)》,第209页。

④ 冯力生:《回忆解放后首次祭谒黄帝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黄陵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黄陵文史资料》第6辑,第19页。

⑤ 贾自新编:《杜斌丞年谱》,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234页。

⑥ 黄陵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黄陵县志》,西安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页。

⑦ 《军政委员会代表等谒祭黄帝陵寝》,《群众日报》1950年4月15日,第1版。

⑧ 《西北区、陕西省各界祭扫轩辕黄帝陵墓》,《人民日报》1953年4月8日,第3版。

⑨ 《陕西各界代表祭轩辕黄帝陵 在杭州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扫岳飞墓》,《人民日报》1957年4月7日,第4版。

⑩ 《关于祭黄帝陵对联问题的意见》,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档号(以下简称陕档):185-1-1661-12,第56页。

⑪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8页。

⑫ 参见邓沛:《延安公祭成吉思汗的活动》,《文史精华》2005年第5期。

⑬ 李俊领:《仪式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礼》,杨凤成主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2辑,第82页。

建、迷信、落后”^①，是“旧的、封建的习惯势力，是落后的迷信活动”^②。对此，《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南方日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等报纸组织经过讨论，认为“献花圈和烧钱纸不能相提并论”，“献花圈只是一种纪念仪式”，而烧钱纸是有鬼论的迷信思想^③。但也正如有论者指出“反封建，不一定要一古脑儿把祖宗全反掉”，有群众看到“上级纪念孙中山先生，追悼任弼时同志，‘民族扫墓节’为轩辕黄帝扫墓；他们觉得上坟也是自己对自己祖先的一点纪念表示”，因此对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祭仪，应通过宣传教育来解决，强制手段是不能奏效的^④。“党和人民政府历来对于人民群众的风俗习惯是尊重的，不加干预的”^⑤。可见，“文革”前对于传统祭仪态度是比较宽容的。更何况这一时期的黄陵祭祀如下文所述，带有一定的统战色彩，故而一些看似落后于时代的祭仪得以保留。

有学者认为，陕甘宁边区和新中国的祭黄陵仪式与民国祭仪主要有两点重大区别，一是增加了主祭人讲话，二是祭文使用了白话文^⑥。相较之下，国民党确实从未使用过白话文祭文。但结合现实政治需要进行演讲等，在国民党主导的政治仪式运作中也并不鲜见。例如1930年国民党上海市执委会组织的先烈纪念大会，其程序为：开会，奏哀乐，唱党歌，向党国旗总理遗像及烈士灵位行最敬礼，主席恭读总理遗嘱，献花，静默三分钟，为72烈士志哀，恭读祭文，主席致开会辞，演说，呼口号，奏哀乐，散会^⑦。可见这些程序与中共的祭仪几乎如出一辙，但二者还是有着气质上的根本不同。在国民党的公祭大会上，往往由达官贵人训话，而鲜见民众演说的身影，且内容空洞，十分程式化。总而言之，国民党的祭典上带有浓厚的“伦理化与等级化特色”^⑧和“党国化”色彩。而中共则十分善于运用通俗易懂的祭文、口号标语以及结合时事的演讲，进行政治动员，带有鲜明的大众性。

其实，中国共产党通过祭黄帝陵所彰显出与国民党如此相异的气质，并不在于二者在仪式程序上有什么区别，而取决于两党背后全然不同的阶级基础、政治理念与政治文化。

二、“劳动者的先人”：重塑“黄帝符号”的新意义

在古代中国，黄帝被视为上古大神、军事家、医药神、发明家、圣王。还有一些王室贵族号称系黄帝苗裔。只是在20世纪以前，黄帝“从没有被称为整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共同祖先”^⑨。20世纪初，章太炎等人将黄帝视为汉族始祖，开启了黄帝崇拜的新风潮^⑩。通过黄帝画像、黄帝纪年等方式，黄帝被赋予“汉族始祖”或“中华民族始祖”的种种新意义。经过一番重塑，“黄帝”

① 韩川：《关于上坟》，《人民日报》1956年11月30日，第8版。

② 陈明德、陈子新、赵鹏飞：《怎样对待清明扫墓问题》，《人民日报》1965年3月31日，第2版。

③ 《移风易俗话“清明”》，《人民日报》1964年4月10日，第2版。

④ 韩川：《关于上坟》，《人民日报》1956年11月30日，第8版。

⑤ 陈明德、陈子新、赵鹏飞：《怎样对待清明扫墓问题》，《人民日报》1965年3月31日，第2版。

⑥ 李俊领：《仪式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礼》，杨凤成主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2辑，第87～88页。

⑦ 《昨日纪念黄花岗先烈》，《申报》1930年3月30日，第4张第13版。

⑧ 李俊领、殷定泉：《抗战时期的黄陵祭祀典礼》，《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⑨ [澳]刘莉：《中国祖先崇拜的起源和种族神话》，星灿译，《南方文物》2006年第3期。该文认为，“第一次明确地把黄帝作为汉族人民的祖先，见诸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祭祀黄帝的祭文”。实际上可能更早一些即有这种说法，如1903年的《民报》和1904年的《黄帝魂》即有相关论述。参见下条注释。

⑩ 参见沈松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号，1997年。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日]石川祯浩：《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排满、肖像、西方起源论》，《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日益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符号,被誉为“睿智神明”的“元祖”^①。自然,祭黄帝陵也是这个“黄帝符号”重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从1948~1964年,中共除保留黄帝“中华民族始祖”的象征外,还通过黄帝陵祭祀赋予黄帝“劳动人民的先驱”这一崭新的意义。

1948年陕甘宁边区祭陵祭文称,“伟大的轩辕黄帝,你是我民族的始祖,你是我劳动者的先人,历史的创造者,从你那一时代起,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即劳动生息繁衍于这幅员广大的领域,并以自己的劳动团结和努力不断战胜黑暗,争取光明”^②。除“民族始祖”这一传统称号外,黄帝与“劳动人民”的关系被紧密地联系起来。祭文还指出,抗战胜利后“我国人民最大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并指责“以蒋介石为首的我国反动派,为要维持其祸国殃民的统治,不惜充当美国帝国主义走狗”,丧权辱国,发动内战,导致“莽莽神州,遍地腥膻,优秀儿女,任人凌辱”。祭文痛斥“人民公敌蒋介石此种窃国卖国的滔天罪行,较卖国贼袁世凯、汪精卫之流,实有过之无不及”。总而言之,祭文将黄帝陵与劳动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宣示无论“反革命匪帮如何拼命挣扎”,“四万万五千万优秀的黄帝子孙,定能团结一致的在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坚决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匪帮,早日实现全国胜利!”^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黄帝陵祭祀活动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强化“黄帝符号”的“劳动人民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强调中国历史的成就是“自轩辕黄帝以来中国人民的劳动创造和伟大发明”^④;另一方面则是进行今昔对比,以过去劳动人民生活之苦难,对比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生活之幸福。例如1961年,主祭人陕西省副省长任谦再向群众发表演讲时表示,历朝历代的祖先虽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劳动人民一直在反动的统治下,终日呻吟”,特别是近百年来更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过着贫苦的生活,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才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在各方面“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跨越发展”,“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获得新生的时代”^⑤。

除了这种内涵的表征外,中共祭黄帝陵的“劳动人民性”就形式和内容而言还体现在使用白话文祭文、演讲以及劳动人民的深度参与等方面。国民党在祭黄帝陵时,一向采用符合传统习惯的四字一句文言祭文,虽然引经据典、文辞雅驯,但对于旧社会的一般劳动群众来说,难免感到诘屈聱耳、难以理解。因此,虽然国民党的祭礼往往也有规模达千人乃至数万人的群众观礼^⑥,表面上“足见民族意识之高涨”^⑦,但有多少群众真正接受其想传达的理念和思想,则需要打上一个问号。相较之下,中国共产党使用白话文祭文并进行通俗易懂的演讲则更容易向劳动群众传达自己的思想观点,这也正是其长期走群众路线的一种表现。例如1960年祭陵时,任谦便是向“同志们、同学们、乡亲们”讲话,语气恳切而语言通俗^⑧。1948年的祭陵结束后,有群众议

①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祭文》,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9页。

② 《刘副主席、赵副司令员、甘主任代表西北各界隆重谒祭黄帝陵》,《群众日报》1948年4月10日,第1版。

③ 《刘副主席、赵副司令员、甘主任代表西北各界隆重谒祭黄帝陵》,《群众日报》1948年4月10日,第1版。

④ 《农历清明佳节西北各界公祭黄帝陵》,《光明日报》1951年4月7日,第1版。

⑤ 《关于祭扫黄帝陵墓时的讲话》,陕档185-1-1661-15,第60~61页。

⑥ 参见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陕西省志·黄帝陵志》,第141~144页。

⑦ 《中枢代表祭扫先陵之经过》,《中央日报》1935年4月15日,第1张第2版。

⑧ 《关于祭扫黄帝陵墓时的讲话》,陕档185-1-1661-15,第60~67页。

论“这一次人民的祭典”说，“过去国民党祭陵，只有老百姓遭殃的份，没有老百姓参观的份”，“他不让老百姓参加，是他做贼心虚，怕老百姓”^①。

此外，劳动群众也在解放后才得以登台祭祀并讲话，而不仅仅作为无声的听众。例如1951年的黄帝陵祭典，除了西北军政委员会、陕西省政府和延安专区的官员代表外，该县劳动英雄代表鲁宗明、妇女代表常养珍、青年代表张瑞吉等也参与祭祀并在陵前发表讲话。这些讲话“一致指出要继承和发扬自轩辕黄帝以来中国人民的劳动创造和伟大发明，以及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并贯彻于当前的各种工作中去，为消灭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保卫祖国与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劳动英雄代表鲁宗明还专门宣布该村全村和他个人今年争取丰收增产的计划。若干农民及青年、妇女纷纷将自己从山上采集的鲜花、柏枝呈献于陵前，并高呼：“爱护祖国！”“保卫祖国！”“争取今年大丰收！”“消灭美国侵略者！”等口号^②。从参与者到演讲的内容和高呼的口号，都凸显劳动与人民因素，给“黄帝符号”带来了崭新的内涵。

三、对国民党的斗争与统战：黄陵祭典的意义(一)

抗战时期，黄陵祭典就曾为国共两党在政治上角力的舞台^③。解放后，中共在祭黄帝陵时，先是将蒋介石集团视为黄帝的“不肖子孙”加以抨击，而后又随着形势变化，强调中华民族“黄帝子孙”的身份认同，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蒋介石集团和台湾同胞等做统一战线的工作。

1948至1949年间，国共双方进行着事关中国命运的决战。除军事斗争外，政治上也是双方博弈的重要战场。如前所述，中共赋予“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的新属性，从而把蒋介石集团与“黄帝符号”切割开来。既然黄帝是“劳动人民的先人”，那么“人民公敌蒋介石”和“地主阶级”作为反人民的“大堡垒”和“小堡垒”^④，是黄帝的“不肖子孙”^⑤，自然是被抛弃的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国民党残部还占据台湾、海南岛等沿海岛屿。此时，中共的政策是以战争方式武力解放台湾。因此，1950年的黄帝陵祭典上西北军政委员会代表讲话称“蒋匪余孽”为“黄帝的不肖子孙”，并提出要“支援台湾、西藏、海南岛的最后解放”^⑥。

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武力解放台湾的军事行动被迫推迟。随着形势变化，中共对台政策也有所调整。1954年7月，在日内瓦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破坏美蒋订立的《共同防御条约》，政治上在国内开展“必须收复台湾和揭露美蒋的宣传”，“在全国人民中进行广泛深入的长期的经常的宣传教育工作”^⑦。故而，1955年和1956年的祭黄帝陵文中强调要“早日解放我国神圣领土

① 《刘副主席、赵副司令员、甘主任代表西北各界隆重谒祭黄帝陵》，《群众日报》1948年4月10日，第1版。

② 《农历清明佳节西北各界公祭黄帝陵》，《光明日报》1951年4月7日，第1版。

③ 1937年3、4月间，中共正密切与蒋方接触，谈判关于国共合作有关事宜。毛泽东希望借1937年4月5日的公祭黄帝陵对外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试图通过范长江将其亲自撰写的《祭黄帝陵文》通过《大公报》等渠道发表。国民党则刻意淡化中共参与祭陵的意义，凸显其“党治”模式的权力秩序。1938年，张国焘则借以陕甘宁边区副主席身份参加祭陵之机，叛党出走。而国民党借此大做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此外，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67页。《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7页。李俊领、殷定泉：《抗战时期的黄陵祭祀典礼》，《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④ 《刘副主席、赵副司令员、甘主任代表西北各界隆重谒祭黄帝陵》，《群众日报》1948年4月10日，第1版。

⑤ 《陕甘宁清明节祭扫黄帝陵仪式极为庄严隆重赵寿山将军陵前痛斥蒋贼》，《人民日报》1948年4月13日，第2版。《军政委员会代表等谒祭黄帝陵寝》，《群众日报》1950年4月15日，第1版。

⑥ 《军政委员会代表等谒祭黄帝陵寝》，《群众日报》1950年4月15日，第1版。

⑦ 《同美蒋斗争的方针和措施》，《邓小平文集》中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5页。

台湾”^①、“一定要解放台湾”^②。

不过鉴于台湾问题的复杂性,经过对局势的反复思考,中共中央及时调整了对台政策。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第一次代表中国政府提出除了武力解放这种方式之外,“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③。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的人员,站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并向国民党军政人员表示:“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④6月28日,他又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已经有不少人表示了他们的爱国愿望”^⑤。因此,相较于早期的针锋相对,此后在祭黄帝陵时主要是宣传“祖国的繁荣和强大,反复介绍新中国各项成就”^⑥,通过“黄帝符号”中“中华民族始祖”的象征意义强化他们的中华民族认同感,“激发其爱国天良”^⑦,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做统战工作。正如1957年祭文中所指明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事业的胜利,将为我黄帝子孙奠定幸福生活的根基”,因而“我国政府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在台湾同胞和国民党军政人员中间,已经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⑧。

因此,自50年代以来,中共祭黄帝陵逐渐褪去对国民党尖锐的斗争色彩,逐渐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平台。考察新中国成立以后历次黄帝陵祭典,可以发现它与爱国民主人士特别是站到人民一边的国民党原军政人员等有着密切联系。例如1951年祭黄帝陵的主祭人是成柏仁和冯一航^⑨,1952年是张季纯^⑩,1953年是张治中和赵寿山^⑪,1954年和1956年是韩兆鹗^⑫,1955年是成伯仁,1959年和1960年是孙蔚如,1961年是任谦^⑬。他们在历史上都与国民党政权有过联系,但最后站到人民一边,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他们来主祭黄帝陵,一方面彰显出在中共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也表明了和平统一中国的愿望。因此,20世纪50年代以后,祭黄帝陵活动一般不再以“黄帝不肖子孙”攻击蒋介石等去台国民党人,反而以“黄帝子孙”的共同身份认同争取两岸统一。正如1958年李济深在民革第四届代表大会闭幕式上所强调的,“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都是中国人,都是黄帝的子孙”,因此希望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发扬孙中山先生爱国反帝的精神”^⑭。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从1951年起于台湾遥祭黄帝陵。不同于中共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以“黄帝子孙”的认同感感召台湾同胞和国民党军政人员,国民党则试图以遥祭黄帝陵作为其所谓“反共复国”的政治工具。例如1951年首次遥祭仪式上,台湾省政府祭文称,

① 《一九五五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祭文》,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86页。

② 《一九五六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祭文》,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88页。

③ 周恩来:《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人民日报》1955年5月17日,第1版。

④ 周恩来:《政治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页。

⑤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9页。

⑥ 《中央关于侨报及港澳报纸宣传解放台湾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3页。

⑦ 《中央关于侨报及港澳报纸宣传解放台湾问题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第1084页。

⑧ 《一九五七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祭文》,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89页。

⑨ 《农历清明佳节西北各界公祭黄帝陵》,《光明日报》1951年4月7日,第1版。

⑩ 《西北军政委员会等单位代表清明节公祭轩辕黄帝陵》,《人民日报》1952年4月8日,第1版。

⑪ 《西北区、陕西省各界祭扫轩辕黄帝陵墓》,《人民日报》1953年4月8日,第3版。

⑫ 《西北行政委员会派代表清明祭扫黄帝陵墓》,《人民日报》1954年4月7日,第1版。

⑬ 参见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陕西省志·黄帝陵志》,第143、146~147页。

⑭ 《促进社会主义根本改造的大会民革第四届代表大会闭幕》,《人民日报》1958年12月5日,第6版。

“枪念沦胥，弥怀尊攘”，宣称要“还我河山”^①。体现出其以遥祭仪式进行所谓“反攻大陆”宣传的企图。不过国民党在台遥祭黄帝陵也并非完全没有正面意义，它毕竟在台湾同胞中强调了“黄帝子孙”的中华民族认同感。正如时人申论为何要遥祭黄帝陵时所指出的：“台湾作为炎黄子孙的事实，是任凭日本奴化教育也改变不了的”，“台湾人的祖先皆来自中华本土，与现在迁入的同胞无异”，“我们不该数典忘祖”^②。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也成为国民党对海外台独人士招降时的宣传场景之一”^③。由此，台海两岸均通过祭黄帝陵强化两岸人民均属“黄帝子孙”的历史记忆和认同。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祭仪甚至比其在大陆时期更为封闭，“参与祭祀者几乎全为政府官员”，其遥祭“所引起的回响日渐仅及于每年民族扫墓节中刊载报纸上的一则小小启示”^④。比起中国共产党赋予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在凝聚力、号召力上可谓差之千里。

四、动员群众积极参加革命与建设：黄陵祭典的意义(二)

在这一时期黄帝陵祭祀活动中，通过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祭文、简洁有力的标语式对联和晓畅激情的演讲，中共总结过去一年的成绩，并提出接下来一年的重要目标，传达其政治主张，以实现政治动员和对民众的教育。

1948年和1949年祭黄帝陵时，解放战争尚在进行。1950年清明节祭陵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成立了，但仍有蒋军残部留在大陆上。因此这三年的黄帝陵祭祀，一方面如上所述，通过赋予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这一崭新的意义，区分了“黄帝优秀子孙”和“黄帝不肖子孙”，动员群众参与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另一方面，又针对普通百姓最为关心的土地等问题，号召“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平分土地，使人人有饭吃，过好光景”^⑤。1950年6月，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结束，此后黄帝陵祭典中基本未再对国民党发起直接的宣传攻势，而是随着时势的变化，激励人民群众参与到革命生产的各项工作中去。这种动员主要是通过祭文、演讲和口号来进行的。

首先是回顾和总结过去一年的成就，凸显新中国蒸蒸日上的发展前景。解放后的黄帝陵祭祀由西北大区或陕西省层级主祭，在祭文和演讲中，对过去一年在国内国际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总结。例如，1956年清明节祭黄帝陵时，祭文开头便宣布，全国范围内“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将于“今年基本上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明年将“基本上完成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⑥。1957年的祭文指出，“全国人民正在‘勤俭建国’的号召下”，“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同时“数千年的文化、科学遗产，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正在继续发扬光大”^⑦。1958年的祭文则指出“去年打退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全面获得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全国人民响

① 《清明节缅怀远祖中樞暨省会各界昨遥祭黄陵余井塘代表总统主祭》，《中央日报》1951年4月6日第3版，转引自周俊宇：《塑造党国之民——中华民国国定节日的历史考察》，第146页。

② 李建兴：《清明节遥祭黄帝陵的来由》，《中央日报》1951年4月6日，第4版，转引自周俊宇：《塑造党国之民——中华民国国定节日的历史考察》，第147页。

③ 周俊宇：《塑造党国之民——中华民国国定节日的历史考察》，第156页。

④ 周俊宇：《塑造党国之民——中华民国国定节日的历史考察》，第147~148页。

⑤ 《刘副主席、赵副司令、甘主任代表西北各界隆重谒祭黄帝陵》，《群众日报》1948年4月10日，第1版。

⑥ 《一九五六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祭文》，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87页。

⑦ 《一九五七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祭文》，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89页。

应“多、快、好、省”的方针展开“二五计划”建设^①。1959年的祭文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是“我国社会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发展”，“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创造了最好的条件”^②。1960年的祭文列举过去一年在工农业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指出“经过两年持续大跃进，我国人民已经提前三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③。1961年同样是列举各种数据，证明我国工农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提高^④。

其次，新中国的黄帝陵祭典还十分重视宣传国际形势，特别强调维护和平的重要性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祭文常常指出“和平、民主社会主义的力量日益强大”^⑤，社会主义阵营“坚如磐石的团结一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⑥，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加深。总之，是“东风日劲，西风愈衰”，“在世界人民面前，出现这和平、民族解放、民族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辉灿烂的前景”。

再次，在祭文和演讲的最后一部分，则明确传达政治主张，提出奋斗目标，对人民群众进行动员。例如1951年祭陵时，县劳动英雄代表鲁宗明在黄帝陵前宣布该村全村和他个人今年争取丰收增产的计划^⑦。1958年的祭文最后动员群众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要求，“一定要把我国由一个又穷又白又大的落后农业国建成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⑧。在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之后，1960年起党中央和国务院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陈云提出，要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⑨。这一变化也反映在黄陵祭祀的群众动员之中。1961年，任谦在讲话中指出要“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加强多行多业对农业的支援，深入地开展春季生产运动，全力争取农业丰收，首先是夏季农业丰收”^⑩。黄帝陵上悬挂的对联也是一样的口径：“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革命精神，争取今年农业丰收；发扬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全面完成新的任务。”“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一心一意大办农业；全面贯彻执行政党的政策，千方百计增产粮食。”^⑪1963年的祭文中号召要“为农业的丰收，为国民经济的新高涨”而奋斗^⑫。

总之，在黄帝陵祭典上，总结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绩，增进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同时，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的激励下，在一片热血沸腾的气氛之中，进一步动员群众参与到新的各项工作目标中去，从而完成对群众的动员与教育。

五、结语

祭祀一直是中国政治传统中的重要内容，承担着教化民众、维护社会制度的功能。在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强化其统治合法性，通过祭祀黄帝陵而攀附黄帝世系，构建出一条受命于天的政治道

① 《一九五八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祭文》，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90～91页。

② 《一九五九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祭文》，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91～92页。

③ 《一九六〇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祭文》，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94～95页。

④ 《一九六一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祭文》，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97页。

⑤ 《一九五六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祭文》，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87页。

⑥ 《一九五九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祭文》，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93页。

⑦ 《农历清明佳节西北各界公祭黄帝陵》，《光明日报》1951年4月7日，第1版。

⑧ 《一九五八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祭文》，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91页。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7页。

⑩ 《关于祭扫黄帝陵墓时的讲话》，陕档185-1-1661-15，第66页。

⑪ 《关于祭黄帝陵对联的修改意见》，陕档185-1-1661-13，第57页。

⑫ 《关于祭黄帝陵文的报告》，陕档185-1-1963-3，第9页。

统；对于民众而言，则将黄帝等“三皇”视为神仙医祖加以祭祀崇拜。换言之，当时的“黄帝符号”或作为皇室之祖，或作为医药之祖，从未被视为整个民族之祖^①。近代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黄帝符号”被赋予民族始祖的新意涵，或被用于反对现政权，或被用于巩固现政权，黄帝陵祭祀开始被改造为一种现代政治仪式。1935年，国民政府制定“民族扫墓节”，以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名义来祭黄帝陵，使这一现代政治仪式得以初步形成，“黄帝陵祭祀”化为一个公共性的政治仪式，不仅仅是民族精神的象征，也是各政治主体政治合法性的依据。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不仅继承了“黄帝符号”，而且赋予其新的意义：一方面承担着对敌斗争与统一战线功能，一方面则向群众传达政治理念，进行社会动员。这使得作为现代政治仪式的黄帝陵祭祀摆脱了民国时期浓厚的传统民族主义底色，获得了全新的内涵与功能。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北京 100009）

[责任编辑：侯竹青]

《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1期要目

学会历史思维，培养历史眼光，增强历史担当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党史、国史的重要论述	孙业礼
新时代视域下的方志敏精神再论	周 萌
关于中共党史学科定位与建设的若干思考	杨凤城
不妨以更广阔的胸怀来认识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	
——兼论学术观念的自我反思意识	吴志军
明确归属和淡化边界	
——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再出发”刍议	何志明
新时代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理论的三重意涵及其科学化问题	刘雨亭
“时局”历史中的中共早期政治主张	郭若平
农民问题、生产关系论与中国革命的政治经济学脉络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思想和政治动能	周展安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新探（1927—1933）	刁含勇
护法军政府治下的广州五四时期学生运动新探	沈志刚
中共在浙江的早期组织与两个国民党省党部之争（1922—1926）	马 楠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关系再认识	
——历史因果、思想逻辑及必然性问题	李 晔
中国当代史研究方法论两题	董国强
“历史的选择：第一届中共学前沿论坛”综述	王凜然

① 王旭瑞：《历史之为记忆：黄帝祭祀的流变》，《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2期。